

章立凡

章立凡 著

作家出版社

君子之交如水

逝者如斯，人生亦如此……

君子之交如水

章立凡 著

作家出版社

孫宗慶 識

諸書來

張定夫

胡愈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子之交如水/章立凡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63 - 3858 - 5

I. 君… II. 章…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546 号

君子之交如水

作者: 章立凡

责任编辑: 姜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200 千

印张: 18.5

插页: 15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858 - 5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纪念章乃器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沈 荃 九

陳 波 鬼
胡 子 嬰

潘 大 遠

彭 文 應

新門路一九〇弄一
號電話三三七八七五

汪 馥 炎

救 國 志 士

張 宗 麟

張 宗 麟

救国入狱者名片

自序

本书不是人物传记，是介于回忆录与历史资料之间的文本。

现实者，流动之历史；历史者，凝固之现实。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人心中皆有自己的历史图象，有的是亲历的往事，有的是读史后对当时场景的怀想。而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身为研究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下岗学人”，多年来不断有人劝我写父亲的传记，但我不愿写。从专业的角度，亲属所写的传记与悼词、诔文、行状、墓志等属于同类，会因感情因素而难于客观，史料价值大多不高。有时我也不得不写一些父亲的传略，但往往是以第三人称落笔；写回忆录则比较放得开，可以注入一些感情。惟两者均力求叙事准确，征引史料皆有出处。

本书中涉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多被视为“最后的贵族”。但我家高祖以上世代务农，到曾祖这一代有过功名，不过耕读人家而已。其实不少的城市居民，三五代以上皆是农民。父亲曾回忆说，自己小时候是个“乡下孩子”。他有草根性，一贯反对“血统论”，又自承修养差，自然也不会以贵族自命。

就通常的社会评价而言，“贵族”尚无一定的标准，但多已广义化，非专指家谱学意义上的血统贵胄，大抵类于传统意义上博雅而有操守的“君子”。他们是文化积淀的产物，不同于暴发户，故有“换血三代乃成贵族”之说。以今度之，不怕富豪是文盲，可怕的是没有分寸感。“贵族”的气质非财富所能赋予，也不是“贵族学校”所能出

产——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

文化意义上的“贵族”教养与学养兼备，一般会比较低调：澹泊名利，闲适中感受人生；不尚奢华，体面中淡出品味；取之有道，竞争按游戏规则；恪守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富同情心，患难中济困扶危；时穷节现，隐微处无愧青天……。培育这类人需要人文的乳汁，非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所堪造就。在道德文化被摧毁之后急于发家致富，是一个民族的无奈与悲哀。

无论能否成为“贵族”，人生总有诸多遗憾，而最可怕的是生存在一个“以头立地”的时代。本书的背景年代，发生了不少头足倒置的事情，对习惯于用头脑思维的知识分子而言，浪费二十年的有效生命，痛苦是必然的。父亲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他坦然罹受了这种苦难，并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性格，也许正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

历史是客观的，人性成分少；记忆是主观的，人性成分多。但历史是人创造的，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人。有些官修正史往往也不够客观，所以才会有回忆录、口述历史、传记文学等作为补充。

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朋友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章立凡

目录

自序	/1
风雨故人	
“七君子”的大结局	/3
有罪的言者	/19
历史尘封的哲人	/35
乱世逸民	/59
寂寞身前身后事	/88
康有为晚年的“天人之学”	/103
文武二老	/106
“二字天真君谥我”	/124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30
见闻访谈	
却忆当时年少	/159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185
附录	
半个世纪前的名人通讯录	/221
我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经历	/236
我与青年	/248
我和救国会	/253
抗战初期在安徽	/273

①肉会招

闹地不安心，
法问题。

1951年8月10日

大地主共有二百
是二村——东决气斗两个，
打地主。干尸提出打击面大，
干尸能否解决问题，曾干认为
在果。斗理斗法以20元，干打
是又打入斗理斗法。上面指示
口一堵无开中停下来。被斗的
地主拿出了一些。

村——大地主，有200元在的，
总数为120元，加之前整地，闹陪了五个富农
叔的)地主的钱粮，在斗争会想打死地主的钱粮
干中打死之世地主的何敬修，傅号何同之。干水地
该死。但女他地主并不因此恐怖，仍是原样
村——初时让干尸自己讨账，以示无干是
地村论论，及高后了，催促甚急。就提干
又欺骗，被打死了。干尸被斗的拿出了二百元，
大地地主也有些怕。干尸提何高，第二天闹

风雨故人

24日，
在何老
县中训
追理
二位
斗果
拿出
提批

“七君子”的大结局

——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始末

近年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有关 1941 年《日苏中立条约》的论争。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当时救国会领导层对该条约的表态，其中也涉及先父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国会的问题。辩论的双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时，我的意见是：当事人亲属须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争，心平气和地把史实讲清楚就可以了。见仁见智，悉听历史公论。本文的撰写也将遵循这一原则。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主张中苏友好的。他在二十年代就反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促进中苏贸易的机构，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甚至到了“反修防修”的六十年代初，他在罢职闲居的境遇中，还致函周恩来，对中苏交恶表示异议。但父亲除了反对《日苏中立条约》外，在 1957 年还公开批评过斯大林。“独立思考，是非分明”是他一直坚守的原则。

一 光荣出狱，各奔前程

1936 年 11 月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中，救国会领袖们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风范已永垂史册。在狱中他们“六个人是一个人”（史良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投案，另押在女监），对外爱国立场一致；但在具体的政治见解上，则见仁见智，有各自的特色。例如王造时曾经回忆说：

在救国会运动中，我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情绪是比较激烈的，认为只有联合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逼迫他非抗不可，不抗就要垮台，才有使他改变不抵抗政策的可能。当我们七个人被关在苏州的时候，有人在李公朴主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好像是《中国的党派》^①，说救国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正确的，主张拥蒋抗日，以章乃器为代表；一派是不正确的，主张反蒋抗日，以我为代表。我看到这个小册子很不高兴，我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现在我们都关在牢里，却把我说成是反蒋抗日的，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认为该小册子所说的与事实不符；公朴表示事前毫不知情，决定马上通知该社停止发行。^②

虽然大家共同否决了这本书的观点，但也从另一角度表明，王造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激进的。

“七君子”在抗战爆发后出狱，这时救国会已发生微妙的变化。父亲回忆说：

我们从苏州看守所出来之后，便去南京。这时国民党派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伦同我们谈判，要我们解散救国会。我们据理力争，坚持救国会不能解散，一连谈判了三天都没有结果。

① 按系《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张执一著。

② 王造时自述材料，未刊稿，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646页。

我们回到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开始了。救国会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救亡协会。救亡协会的比较重大的一件工作是捐募手套，那是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捐募寒衣运动唱对台戏的。人们嘲笑地说：“一件寒衣要抵多少副手套呢？你们这个唱对台戏的戏台太小了！”唱对台戏本来就违反团结御侮的精神，而又唱得不像样，这不能不是一个失算。我当时写文章建议：赶快埋下头去，把里弄（胡同）居民组织起来，把家庭妇女、儿童老人都卷到救亡工作中去；这种工作做好了，眼前和将来都很有用。我这个建议当时虽然救亡协会负责人没有采纳，但群众还是执行了我的建议。在军事退却后，里弄组织工作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了，——直到敌人占领的最艰苦年月，里弄组织仍然起到它的应有的作用。

随着上海战争的结束，救亡协会也消失了。它的寿命还不到三个月。^①

当时救亡协会的负责人是钱俊瑞，“七君子”由救国会领导人变成了该会的设计委员，只剩下提建议的权利。张友渔晚年曾对我说，这种做法，当时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

父亲一直是持超党派立场投身于救亡运动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第三党的蒋中光先生曾对我说起一段往事：“上海沦陷前夕，我与几名青年去找令尊，问他蒋介石会不会投降，章先生说不会。他的

^①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450页。

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地广人多，回旋余地很大；二是蒋先生要维护自己民族领袖的历史地位，不会轻易投降。”

当时父亲认为救国会团结抗日的主张已经实现，从超党派的立场出发，主张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要“宽大、容忍”，不必再算旧账，不要再有党派和领导权之争。他认为钱俊瑞与国民党唱对台戏，是一种党派之见和内耗。为此双方发生争论，父亲发表了后来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少号召多建议》一文。

父亲当时做了一副对联：“无此闲情算旧帐，有腔热血效前驱”。不久便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线担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在武汉失守前这段时期，章乃器在安徽前线，李公朴去了山西前线，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沙千里秘密加入了中共，七人虽仍有聚会或联系，但行动轨迹已显示出不同。

1939年6月，父亲应蒋介石的电召“赴渝述职”。既是应召前往“述职”，孰料蒋竟然不出见，紧接着又下令“章乃器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其实这是蒋介石使出的“调虎离山”计，原因是父亲在安徽与国民党桂系、中共新四军都合作得很好，不但使濒临破产的省财政扭亏为盈，还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于是该省的国民党CC派和地方势力，纷纷向蒋造谣告密，说他“勾结奸党奸军”，令蒋委员长很不放心。后来经戴笠查明是诬告，蒋介石派贺耀祖来劝说父亲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拟委任他为四联总处^①专员，最后又征求他出任陕西或甘肃省的财政厅厅长，均被父亲拒绝。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

^①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的简称，是国民党官方的金融管理机构。

父亲在重庆同救国会的同事们重聚，由于睽违已久，不免产生隔阂。父亲曾回忆说：

我回到重庆的时候，正值“五·三”大轰炸过去不久，街道上和人的脸上都是一片萧条景象。救国会上层除了韬奋曾经邀我在生活书店作了一次关于安徽青年动员的报告以外，再没有人愿意了解我在安徽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史良甚至当面指责我不该当财政厅长；胡子婴认为我不就工合总干事职，对工合对自己损失都很大；钱俊瑞则散播流言说我要进中央训练团受训。我所得到的最大安慰，是建国初期毛主席说我在安徽为党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做了好事。^①

父亲在入狱前是救国会的灵魂人物，负责宣传和财务，该会的经费，主要出自他的毁家纾难。经过战乱离合，当时救国会已无实体，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存在。“七君子”各自有自己的事业，沈衡老年高德劭，仍被大家尊为“家长”，但老先生在内部能够倚重的，主要是史良。

救国会这时已发生张申府与沈老之间的人事纠纷，父亲感到当时的活动方式，已不可能像往日那样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产生了消极情绪。1941年春，救国会上层因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产生分歧，促使他脱离了救国会。

^① 章乃器：《抗战初期在安徽》，《章乃器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页。

二 对苏表态，最后晚餐

中国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得到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南进”战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极力谋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抽出兵力巩固中国战场，进兵东南亚，从英、美、荷等国手中争夺殖民地和战略资源。而斯大林为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也不愿同日本发生战争，希望把日本的进攻矛头引向南洋。苏联继签订《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四条：“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于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除法西斯国家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斯大林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作出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抉择，除在国际法法理上违约外，也背弃了“胜利了的民族应该为解放被压迫民族

作出更大牺牲”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使中国成为这一条约的最大受害者。

条约签订后，中外舆论哗然，也给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困扰。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是强调既团结又斗争的；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特别是对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共不能不发表声明，维护苏联的威信。同时又重申：“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际上表明了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

救国会的领导人当时曾联名写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认为苏联的这一做法“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并从法理上对条约的内容提出质疑，要求作出解释。

据王造时回忆：“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情的结果，认为救国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然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①，除邹韬奋因生活书店被压迫已潜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早在史良家里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记得陶行知声明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是赞成的，但不赞成

^① 指救国会“七君子”。

公开发表，故未签字。”^①

签字的信件共有两份，一份由沙千里派人送苏联大使潘友新转交斯大林，另一份则由王造时送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交中央社发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后来救国会恐该信被利用作为反苏的口实，于是又安排收回了这一信件。关于此信的收回始末，有两种记载。

一是钱俊瑞说：

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沈钧儒）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周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地讲清楚，对他的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以做一番宣传。”^②

二是萨空了说：

一天我得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有个内部通知，说救国会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条约的签订，此文国内不要发表，可在海外发表。我立即去找李公朴，告诉

①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②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岁诞辰》，《沈钧儒纪念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3页。